

●李 纯 一

山东地区音乐考古及研究课题^{*}

(一)原始时代

山东的考古状况,现在看起来是很不平衡的。按年代顺序,首先接触的是旧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考古在山东,虽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但也有一些可喜的收获。1965年在沂源一号山洞里出土了30多件石器。原始人类所使用的工具能成批出土,就是一个重大发现。1966年在新泰乌珠台又发现一颗牙齿化石,是左下颚的臼齿。据古人类学家研究,可能是个少女,比北京周口店的中国猿人稍晚一些(北京猿人距今六、七十万年)。按古人类学的分类是智人,至少也应该有四、五十万年。这一颗牙齿就把山东的文化史增加了好几十万。

这些发现中没有看到与音乐文化有关的迹象,但我相信音乐艺术的发生很早,应在旧石器时代已产生。大家看过关于黑猩猩和其他一些灵长类动物的科学纪录片,猩猩、狒狒这类灵长动物,有它们的感情,在感情激动时有它们的表现,如鼓掌顿足之类,都接近原始的音乐。如果说原始音乐以节奏为其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人类的心脏跳动,也

就是脉搏之类,就是天然的节奏。人类在集体活动中,也体现一些节奏。这都是探讨音乐起源的一种可行途径。动物在激动的时候,表现为声音,也表现为行动,这些就是原始乐舞的先行状态或先行形态。关于旧石器时代音乐艺术的研究,在全世界都是尖端问题,如果将来在山东省的旧石器考古方面,发现某些线索,找出某些能够探讨的途径,在学术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新石器时代,在整个中国考古学史以及世界考古学史上,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解放以后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在泰安大汶口及邹县野店进行大面积发掘,把它的文化内涵暴露出来了,而且层位比较清楚。一层层往下数,都有遗物。并且除最下层外,每层都有墓葬。这是文化定性,确定其相对年代的有力依据。还有一个可喜的收获,就是它上面的叠压层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在解放前已有发现,但它的来源和去向,总也搞不清。大汶口文化和岳石类型的发现把这个

* 这是李纯一同志1986年1月8日在山东省《民间器乐集成》第五次编辑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讲演节录,由秦序同志根据录音整理。此次发表时,征得作者同意,由本刊作了删节。

线索串起来、打通了。大汶口文化以后接的是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以后接的是岳石类型,岳石类型以后就是商,这一下子就都串起来了。

大汶口文化不仅在山东,在毗连的苏北地区也有大面积的发现。当然这方面还有一些争论,不过较多的人认为它属于大汶口文化。不管争论是什么样情况,它们的文化内涵是一个。

大汶口文化的早、中、晚三个时期是分清清楚楚的。其上限,据碳14的测定,最早距今约六千三、四百年,下限距今约四千四百年。在这两千年的时期里,从现在发表的材料来看,没有乐器,也没有提到发现什么音乐的痕迹。但我怀疑它有,因为在苏北地区邳县小墩子同一文化系统就出现了陶埙,并且不止这一件。同是一种文化,而山东就没有陶埙?这是不太可能的。可能有了,但碎了无法辨认,甚至可能有其它乐器。我相信耐心等待,早晚会有新的发现。

我再提出一个疑问。大汶口晚期墓葬里出土了一个白陶背壶(示意图一),65公分高。它的出土情况很值得研究。它倒在地面上,离它的口很近处,出土(84块)鳄鱼的鳞片,由此推测原有一大张鳄鱼皮。

是不是这张鳄鱼皮原来蒙在这背壶口上,因年久而腐朽,仅残存一堆鳞板?这种发现,可否和国外相应时期的考古发现相互参验?我以此为根据提出这个猜想。不过这种东西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没有先例。大汶口这个白陶背壶和这堆鳞甲是不是所谓的陶鼓,即中国文献所说的瓦鼓或土鼓?同志们如果接触到大汶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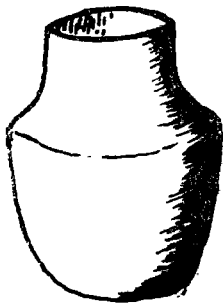


图 一

文化,请看看有没有更多的线索来证实它,或发现其他的乐器。

山东龙山文化直承大汶口文化;它的族属是东夷,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它的年代较清楚,也大致可信,距今约4400年至4000年。分早、中、晚三期。早期可以诸城皇子遗址为代表,中期可以胶县三里河、晚期可以潍坊的姚官庄和莒县大孔村为代表。早期、中期从已发表的材料看,还没有什么音乐方面的线索,但晚期姚官庄已经有埙。不过这埙很小,是一孔的,可能是一种玩具。苏北大墩子所出类似的埙,大半也是玩具。玩具是不是乐器呢?它既然做成乐器,必有所本吧,这个本也许就是正式的乐器。山东龙山文化的这个埙可以断定是乐器,是玩具乐器。因为比它早两、三千年的苏北大汶口文化已经有埙。这个时期有正规的乐器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有待考古发现提供实例而已。

在莒县还出土一个陶角(示意图二)。西安半坡遗址也有,它应该是一种原始乐器。现在有少量发现,虽然不多,但是乐器。



图 二

目前在山东龙山文化中至少可以找到这两种吹奏乐器。但乐器史的发展规律,应该是先有打击乐器。所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肯定有打击乐器,只是未被我们发现,或者有发现但没有被辨认出来。我推测那个白陶背壶可能是土鼓,还有这么一点理论上的

根据。

当然，对原始时期我们所接触到的仅仅是乐器问题，这对一种音乐文化来说是十分可怜的，乐器只是当中一个组成部分，不过是一种表现音乐的手段和工具。就原始音乐文化来说，其内容远比这丰富得多。但这方面问题探讨和研究难度大，涉及问题比较广，需要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民族学、古人类学等等。不仅物质生产，还有精神生产，都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它牵涉学科太多，交叉性太强，空白太多，依傍太少，因此难度太大。

岳石文化类型是刚刚揭露、初步定性的东西，现在材料还很少，发表的东西也很少，考古学界正在扩展这方面的工作，我就更没有资格赘言了。

(二) 商代

商殷考古在山东地区的发现，目前还不十分充足，有缺环。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是相当于商代中期(河南郑州二里岗时期)的济南大辛庄那批墓葬。报道里没有见到什么与音乐有关材料。相当于偃师二里头的早商文化，山东还没有发现，但山东应该有相当于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商的发祥地，现在有很多争议。一个重要的争议是商民族是否起源于山东。有的认为不在山东，最早是在辽东；也有的认为在河南，总之，众说纷纭。但先秦文献中有这类记载，说明它具有发现早商文化，或相当于早商时期文化的可能性。

与商代晚期音乐文化有关的发现为数虽然不多，但如长清兴复河的殷墓和益都苏埠屯的两座大墓，都有一些重要发现。还有惠民麻店商代墓葬出土有一般所谓的铙。益都苏埠屯的大墓没有出土铙，但有铃，它们是否乐器铃尚不能断定，可能大部分是车马铃或

其它装饰铃。苏埠屯的铜器里有铭文，这对音乐考古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铭文有“亚丑”两个字。亚丑应该是一个族、或者一个方国。亚丑的铜器出土很多。亚丑作为族、作为方国，历时很久，在殷墟一期(相当于盘庚到武丁时期，约公元前十四至十三世纪)的甲骨卜辞中就有。苏埠屯出土亚丑铭文的铜器，说明铜器制作者亚丑的所在地很有可能就在这里。在安阳殷墟出土过亚丑的铙和铃，而且数量不算太少。这表明，亚丑这个族或方国是能制造铙和铃的。它们在安阳殷墟出土，当是由亚丑贡去的。现在找到了制造者的所在地，证明当时山东亚丑这个族(国)有设计制造编铙的能力，也反映了它的音乐文化水平。殷墟出土的亚丑铙大都三件一组，就是说三个音的，好象是三声音阶之类的。在现代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倒退三千多年，应是不起的东西。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三声两声这类民间音乐很多；国外民族中，三声两声的音乐也很多。象希腊早期的音阶，最初是两声、然后是三声，再后是四声，最后才进到五声、七声。从当时的历史来看，这不是居于世界的后列，而是居于世界音乐发展的前列。因为象这种铸造出来的铜乐器，能发出所要求的固定音高，不是简单的事情。没有精密的设计，没有相当丰富的、先进的经验是不可能制作出这种先进的乐器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商铙，体内没有太多的磨锉痕迹(磨锉就是进行微调，把音调准)，而周代的钟缚倒是磨锉较多。这是令人惊叹的，说明当时设计水平之高。铙范做好了，铸出来的铙的音就基本准确。另外，成组的编铙，在殷代就已出现。从这一点来说，益都苏埠屯亚丑这个族(方国)具有相当高的音乐水平。亚丑很可能是东夷，也就是“薄姑”(在今之博兴)，这是为较多人所接受的论断。益都苏埠屯挖掘的仅仅是两座大墓，还有好多墓葬待挖掘，我们要关心它。

我推断那里可能有乐器出土。亚丑能向殷王朝进贡乐器,它自己一点不留?

长清兴复河的商代墓葬也有与音乐有关的间接线索。所出铜器上有铭文夔,是它的族徽或者一个方国的标志。带有这个族徽的铜器在其他山东地方,在辽宁、河北、河南都有出土。不仅是乐器,还有大量其它的铜器。这样,这个族或方国,它的疆域,或它的影响面,或它的文化扩展面,就比较清楚了。对探讨这个族的铜乐器制造会有帮助。据现有材料看来,它的年代跨越也很久,大概从相当殷墟一期到周代初期,都有这个族的活动。

另外,还有一个念不出来的字夔,也见于甲骨文,而且一期甲骨卜辞中就有。夔族有它的铜乐器铙,在河南安阳殷墟就出土过。这样就可期待了——河南能出土带这两个族徽的铜乐器铙,山东既然已有带这两个族徽的其他铜器出土,那铜乐器的出土也是有可能的。

根据这些,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初步的认识:商代的音乐文化是多方国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山东至少是商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地。商族起初活动范围主要在河南,以及山东、河北的一部分。山东的同志得天独厚、得地独厚,应该更关心商代音乐文化的研究。

(三) 两周

两周有很大的缺口,要求教于大家。山东是齐鲁之邦,齐国出土文物很多,鲁国的就很少,是什么道理?从音乐考古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大空白、大问号。齐国的钟、编钟,宋代就有发现,《考古图》、《博古图》都有所著录,如齐叔尸(夷)编钟和编钟。但鲁国只有一个鲁濞(原)钟。鲁国其他铜器也有一些,但相比之下,齐国的多得多,这是什

么原因?这个谜得解开它。叔夷编钟、叔夷编钟的铭文表明它们是齐庄公的制品,为公元前548年至553年。齐国出土的不仅有铜乐器,还有陶埙,上面也有铭文。大家看音乐史上引用的有铭文的韶埙、太室埙、豹埙,就是成批在青州即益都出土的。这虽然不是科学发掘,但出土地点确实在青州。

这些都是在解放前或古代出土的东西,就举这么两个例子。齐国的东西不是一件两件,是成批的,成套的。埙现在能查到的就有十二件,出土的可能不止这几件。什么是太室?顾名思义,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是宗庙的大厅。太室埙当然是在太室祭祀祖先时演奏的埙。韶埙是不是演奏《韶》乐的埙?不敢说。豹埙也搞不清楚。但太室埙可以肯定。这些埙大小不一,形制不同,显然是配套或在不同场合使用的。

解放后出土齐国的东西也不少。象临淄齐故都河崖头出土的编钟,是常为人们所称道的。出土的铜器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跨越年代较长。象郎家庄殉人墓里出土有磬,现在知道有三件,大概不应是,可能有的损坏了。另有钟、编钟。临淄大夫观四号墓的编钟编磬,还没有正式发表,临朐杨善乡的编钟、编钟和编磬,是齐公孙灶时候的乐器,据公布的材料看,钟、编钟似为明器。诸城藏家庄出土的编钟、编钟、编磬,较晚,属于战国时期。举这么一点点例子,可以说明齐国的音乐文物,代有出现,呈系列出现。但鲁国的音乐文物就知道一个鲁原编钟。这是什么道理?是鲁国穷?文献记载不穷。是鲁国缺少音乐文化?鲁是礼乐大国,“周礼尽在鲁”,季札曾“请观于周乐”。文献记载很清楚。为什么礼乐大国没有,别的小国倒有了?这真是一个谜,是考古学不平衡造成的?现在鲁国故都已勘测清楚,也发掘不少鲁国墓葬,情况究竟如何?仍不十分明确,所以一直想去曲阜了解一下其中缘由(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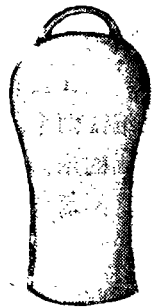
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孔祥林同志介绍，近年鲁故城勘探中，的确极少见音乐文物出土。——整理者注)。

过两天我还想到齐国故都临淄去，这也是基于一个想法：《周礼·考工记》所载鼓、磬、钟的制造方法，是我国现存最早文献记载。此书作者的国别，据郭老研究，很可能是齐人。我就想按《考工记》所设定的规格去看看齐国的出土文物，比较比较，看看是不是对上号，是不是真是齐人的著作。因为其他地方大量出土东西，总跟《考工记》的规格有出入。如果《考工记》与齐国的东西对上号，则《考工记》著作的国别就有可能敲定，它的年代也可相应地确定下来。现在说是春秋战国时期，跨度有五、六百年，未免笼统。

山东地方有很多小国，如纪国、莒国、郟国、滕国，等等。象纪国的东西早在清代就有出土。纪侯台出土的纪侯钟，旋上有环，那是中国出土唯一的带环钟。这是西周时候的钟。纪在铭文上是己或翼，在文献上则是纪。纪国铜器出土很多，1969年在烟台上夬(Kuàng)村纪国墓出土的编钟和铃，要晚一些，属春秋时期。纪国很小，大概只有今天半个县大。它从西周到春秋都有编钟出土，那么一点小国都有，鲁国是大邦，现在一样也没有见到，越比就越大惑不解。

再说莒国。莒南大店老龙腰一号二号墓出土编钟、编磬、编铎，这两墓是带殉人的墓。文献也许对上号了，一般认为莒国国君所作，即《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六所说的兹平公。铭文上标出了作器者，并有史可查。天井汪出土的编钟、编铎，年代也差不多是春秋中晚期。最近又公布了沂水刘家店子两座墓葬的发掘简报，这在音乐考古上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里面有编钟、编铎、编磬，这不稀奇，还出土了一件罍于(或简称为罍)。它的时代是春秋中期。罍于的历史

是有争议的，徐中舒先生据文献以及器型学、文字学、语言学的研究，认为罍于应该起源于山东。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在长江流域，或安徽或浙江一带，是古代越族的东西。这两种说法都未被普遍接受，都是一家之言。现在出土这件罍于，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它的形制比较古老。肩上面没有盘，素纽，不带纹饰(图三)。一般常见是虎纽，少量是马纽。这个素纽与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是一样的，但它的形制更老；而且它的年代比蔡侯墓早，属于春秋中期，蔡侯墓属于春秋晚期。从考古发现来看，罍于在中原地区出土少，在较边远地区象湖南、湖北、四川出土较多。因此又有人认为是少数民族的乐器。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可能要重新考虑。因为后者形制、年代都比较晚。大家有兴趣的话，这就是一个题目。



图三

再有就是郟国。刚才说到的乐器，都是在各国国都范围之内出土的。郟就是郟，即今之邹县。郟国也是个小国，但传世的东西很多，早有出土，也早有著录。象郟公孙搏、郟公钊编钟、郟公孙怪编钟，郟公孙华编钟，郟大宰钟，等等。这个国那么小，但传世的乐器却那么多，是惊人的。看起来和它的国力不相称。是不是这个国家音乐风气很盛，音乐很发达？不清楚。新出土的东西现在还没有看见报道过。根据过去的著录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课题。郟国后来被鲁国所灭。鲁国是大国，更应该拥有自己的乐器了。

滕县即古滕国所在地。大家都看过电视报道出土的编钟、编磬、编铎，属于战国时期的东西。

再有就是郟国，在临沂西花园涑河北岸

出土了九件一组的编钟。这是见于报道的。

这些国家乐器的特点如何, 共性如何, 都不清楚。这就是课题。如果从形制和测音这两方面进行研究, 能够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 就可以大大充实早期音乐文化史。

山东还有个值得注意的地区, 就是滨海地区。这一带正式发掘很少, “文革”前有一些普查, 查到钟、鐃于、罍三种, 形制、花纹与别地不一样。如果莱夷是在海边, 那这是否与莱夷有关? 这是值得探讨的又一个问题。现在公布材料的有海阳嘴子前一号墓出土编罍两个, 编钟五件。只有这么一批科学发掘的乐器, 其他都是普查的东西。但它们均具鲜明特色。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四)秦 汉

老实说, 这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只好勉为其难, 把自己耳濡目染的一些东西介绍给大家。

秦汉时期, 山东是重要的经济文化区, 经济文化十分发达, 文献记载秦始皇的三十六郡中, 好几个在这里; 汉代好多个郡、好多个封国也在这里。

音乐考古方面也见到一些报道。比方海阳曾发现一件虎纽罍于。从图示上看, 我认为它不会早于汉, 它和沂水刘家店子春秋中期墓罍于, 给罍于起源于山东说增添了两条物证。有早期的, 又有晚期的, 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莱西岱野西汉墓中出土明器瑟。瑟在南方(如湖南湖北)就出土许多, 两省馆藏上百件, 数量是惊人的。要知道它是木器, 保存到现在的很不容易。但为什么北方就那么少? 莱西出土虽是明器, 但既有明器, 就必有真正的实物。这可用大量的汉画像石来证明。嘉祥武氏祠、滕县微子墓、汶上孙家村、济宁两城山、沂南古墓等画像石上的瑟的图象, 即

其适例。其中一些图象与湖南、湖北楚汉古墓所出实物完全吻合, 都是四“枘”四岳式。

济南无影山西汉墓出土的杂技乐舞陶俑群, 能说明很多问题。就乐器方面来看, 其中有编钟, 有建鼓, 还有侧放在架子上的小鼓。这小鼓究竟应该叫什么名字? 我国古代的小鼓很多, 文献记载有应、鞀、鞀, 到底应该叫什么? 值得研究。就乐队编制或乐队组织来说, 也可以写文章。其它乐器也有不少文章好做。比如陶瑟, 可以和前面提到的明器瑟相互参证, 还可以跟其他地方出土的实物瑟、跟汉画像石上的图象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临沂银雀山九号汉墓出土的帛画里面鼓瑟的图象, 都可以综合起来研究, 看看山东的瑟跟南方瑟究竟有什么差别。

这些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汉画像石的琴瑟。有关汉画像石的很多报告和报道大多说里面有琴, 很少提到瑟。这琴是什么样的琴呢? 有这样的图象(图四之A), 把它叫做琴, 大概还比较可信; 还有一种图象(图四之B), 尾部有三个或四个小圆圈的, 也把它叫做瑟, 大概就靠不住。无影山陶俑群所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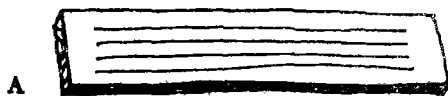


图 四

的瑟上面就有四个圆圈, 这圆圈就是“枘”, 所以它是瑟。可见要识别汉画像石中的乐

器，应该跟出土实物对号。当然，也应该联系文献记载，才能保证研究的准确性。比如山东画象石中，有化妆老虎弹瑟的，若说是弹琴，就恐怕不对，其实这就是汉赋中所说的“白虎鼓瑟”。

曲阜九龙山汉墓里出土有磬，这磬是不是实物，还值得研究；还出土有埙，是鸟形的陶埙。鸟形的陶埙后世也有，在南方，比如四川也见到过，还有牛头哨。联系起来看，也可以对埙的历史进行新探讨。早的，据苏北邳县大墩子遗址的埙可以推断山东有；稍晚的，有姚官庄埙；再晚些，有两周时期的，还有汉的。联系起来看，它们中间应该没有间断。这样，山东地区的埙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如果加上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多学科交叉研究，恐怕成绩就更大些。

汉画象石是山东的一个骄傲。根据现在出土情况看，汉画象石比较集中在四个地区，山东、苏北是其中之一。其他如陕北、晋西北地区，（河南）南阳、（湖北）襄樊地区，四川的江北、合川地区。

山东、苏北地区出土的汉画象石约占全国的一半，数量惊人。而山东本省又约有50%左右出自鲁南的济宁地区及其北的临沂地区。因此山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对在济宁和临沂地区工作的同志来说，宝在眼前，大有可为。当然汉画象石有它的局限性，局限于墓葬。而能有这样墓葬的，决非一般老百姓。所以它的阶级局限性十分明显，都属社会上层、统治阶级。但另一方面有它的完整性，它不象有些古文献记载那样零散，而是集中的，把它整个生活所涉及的主要范围，全都刻画下来。音乐不过是它整个生活的一部分，是墓葬石刻反映的死者生前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还有一个可以期望的方面，这就是它还有相当大的潜藏量。我相信将来还会不断出土，并且不仅是数量

上，恐怕内容上也会有新的突破。

国内发现的汉画象石中，要算沂南画象石涉及音乐的内容最多。沂南墓的年代，比较多的人认为是东汉或东汉晚期。沂南古墓不但内容丰富，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图象清晰，比较细致、比较具体。象这样既完整丰富，又清晰具体的发现，迄今还没有见到第二个。当然，孝堂山、郭氏石祠和武氏墓群石刻在过去是了不起的，但它们不是科学发掘的。还有不少画象石弄得很零散，如何复原，也是有待进行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解放以来，山东省汉画象石的发现范围扩大了，沂南、临沂、安丘、济南、肥城、诸城等地都有重要的发现，可惜我们多未见到正式的发掘报告，都是简报。将来正式报告出来，才能放心地使用这些材料。山东现在大概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县市，即六十多个县市都发现了汉画象石，这在全国来说是首屈一指的，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济宁到临沂一带靠南地区。为什么出在这些地方？一方面因为靠山，有石头，有材料；另一方面有这种经济力量、文化力量，《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对这个地方有详细的记载，什么郡，什么国，出产什么，封谁在此，谁在这里世代相袭，都有。再有很多汉赋。研究画象石不能丢开汉赋。有些东西如果和汉画象石对照起来，可以求得较为确切的解释。象“鱼龙曼衍”，过去了解得很抽象，一看沂南的画象石，有化妆成龙的、有化妆成鱼的，有化妆成鸟的，在那儿耍百戏，就容易理解了。“白虎鼓瑟，苍笙吹簾”，过去不太清楚，一看山东画象石，有这种化妆表演，就明白多了。过去有人认为那只是想象之词，现在看来，当时有钱人确有这种文化娱乐。

画象石的年代，据现有的材料看来，大概是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末期，也就是公元前60年左右到纪元后220年左右，年代跨度约

280年左右,与其它三个地区的年代跨度大致相对应。说明这是当时有钱人家、权贵和巨商富贾们的风尚。

关于其中的音乐内容,虽然有些研究,但多是停留在文献考证上。从音乐史角度看,还是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因为这种考证的结果多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搁在哪里都能用,未必全都可取。真理总是具体的,不但要认识它的共性,更重要的是认识它的特性。音乐学研究,应该着力从音乐特性上去研究,研究它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独特在哪里。举个例子来说(这有点象望文生训,提供给大家参考,帮助开拓思路),瑟在汉画石中与人身身的比例,综合起来看,大概有人身一半长,50%到60%的样子,而在一些四川画像砖上,却长好多,约为身长的三分之二。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个研究课题。这不仅是尺寸问题,关系到乐器学与乐器地理学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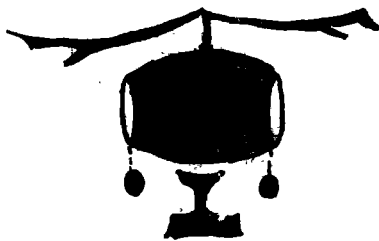
又如,沂南古墓画中的笙,尺寸很大,约为人的长度的三分之一以上。(图五)一般的笙能有这么长吗?没有。不少考古文章和考古报告里说它是笙,其实它应该是大型的笙——竽(“滥竽充数”的竽)。把这个图象与马王堆出土的竽去对照,正好相符。上面也有飘带(也叫绦),嘴子也是长的,吹法也一样。这就有研究头了。究竟是马王堆的早还是这个沂南古墓画象石的早?是从哪里传到哪里?齐宣王时的滥竽充数不是有可信的文献记载吗?我们不妨进行一番遐想,



图五

竽是不是最早出现在山东?有没有这种可能?

再如,汉画石里有好多建鼓,下面一般是个老虎座子,总有两人在旁边击鼓跳舞。大家注意建鼓下面有两个圆的,这是乐器还是什么装饰品?有的还带个提梁,它是小鼓,是旁的乐器,还是其他东西?(图六)。



图六

以上几个例子,恐怕我们一时解答不了,那就以后再一起来研究解决吧。

汉画石里面有许多是表现乐舞的。其中有些现在常常解释为七盘舞、建鼓舞之类。建鼓舞在文献上没有什么反映,七盘舞有。还有其他的乐舞,现在也说不清楚。这也是一个课题。从文献记载看来不止这两三样,名目很多,所以很有研究余地。

还有百戏,就是杂技。有的项目很好解释,比如跳剑、飞丸、高绳(绳技)、寻橦(顶竿)等等,这些是常见的。有的叫不出名目来。举例来说,汉画像石和济南无影山陶俑群,里边都有一个赤身裸背、丑陋不堪的矮胖子,作滑稽状,他究竟是做什么的?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他与当时的俳优有没有关系?是否与说唱表演有关?现在还不能得到定性的解答,也很少有人进行这方面探讨。从某种情况看,他又带有指挥性质,处于指挥地位,但现在无法确定。这也是一个难题。

至于歌唱,这比较多。一般都一手笼耳听回音,从民族学的调查可以证明是歌唱。歌唱有的是击掌为节,这是比较清楚的。

乐队的组织和乐器的组合是一个课题。我们不能根据汉画像石百分之百地认定当时

乐队就是这几件乐器构成。它只是一种象征、代表而已。它的瑟就画那么两三根弦，你能说当时瑟就是两根弦或三根弦吗？肯定不是，只是示意而已。乐队的情况和编制都同此情况，千万不能认为就这几件乐器构成乐队。要结合文献进行研究。

我们现在看到的乐器有三类：打击乐器、吹管乐器、弹弦乐器。

打击乐器中建鼓是最常见的，还有小鼓，还有鼗（就是拨浪鼓），还有编磬、编钟。还有一种乐器，不知叫什么，拿在手上敲，有的说是钲，有的说是铎。到底是什么，没法说。它只是隐隐绰绰的形状，不仅要结合文献，还要结合考古材料来研究。

吹管乐器以排箫为最多。还有一种相当于洞箫的东西，有人说相当于竖笛，这个名称不见于典籍，不能作为正式名称。它的构造相当于现在的洞箫。洞箫一类乐器早已有之，汉画象石这个是不是洞箫呢？现在还有不同说法，这也是个题目。还有篪，比较少见。山东没有见到典型的篪，南阳有。它的篪有一个嘴子，横吹（图七），上面嘴子古代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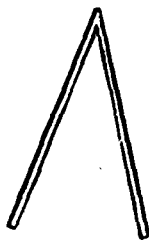
叫翘，这与文献记载相符合。山东很少见，有的象，要等将来看了原石，才能确定。提出这么个问题，请大家注意，汉画象石里究竟有没有篪？我相信应该有。

还有一种东西，是双管（图八），拿着吹。究竟叫什么？它与古埃及、希腊壁画中的奥洛斯（Aulos）一样。希腊的奥洛斯是从埃及传来的。据中国古文献记载，有一种叫做“管”的乐器，是“并俩而吹之”。它是不是管？文献上的管至今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定性发现。《诗经》里总是箫管并举，其他一些先秦文献也常提到管，就是没有考古发现。这

也是一个谜。山东和其他地方的画象石里有少量的这种双管乐器，我怀疑它是管，这种怀疑是否对，请大家指教。

如是，那还要追究一下，是外来的，还是固有的？

据《诗经》来看，西周末年已出现这个名字，



图八

即公元前八、九世纪左右。如果可信的话，那不比希腊晚。管的历史研究也是一个课题。还有一种乐器也没法定，光见两手捧着吹，吹的什么玩艺儿也不知道。有的人说是埙，这种说法可取。但确否，待证。

弦乐器有瑟和琴。瑟是很清楚的，山东地区好多瑟头上都带圈（即“柄”），两个圈、三个圈、四个圈的，肯定是瑟。不带圈的，象武梁祠荆轲刺秦王，拿的东西那么短，而且放在大腿上，可能是琴。比瑟小一点、窄一点的可能是琴。那么，筑有没有？《战国策》说齐国首都之民“无不”“击筑”，看来筑好象也是北方的乐器。山东南邻的连云港西汉墓出土一个漆奁上有击筑图象（图九）一人左手持筑柄，右手持棒敲奏。我相信山东汉画象石也会有反映。希望大家去发现。



图九

山东秦汉以后不是没有出土音乐文物了。比如邹县朱檀墓出土的“天海风涛”琴，上面有重要的题铭，说是雷威制的，这在古琴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物证。

限于我所知，时间也到了，就此打住。

本文绘图：张爱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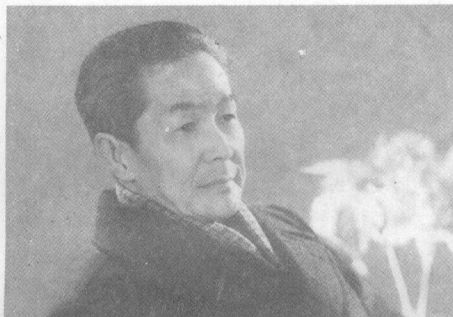
〔编辑部收到本文日期：1986年3月27日〕



李纯一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家。天津市人。1920年生。幼读私塾,兼习音乐;入中学后,又兼学训诂。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参加抗战工作和学运工作。1942年入重庆国立歌剧学校,翌年因避特务追综而转移。1946年到山东解放区,后转赴东北。历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乐部研究室副主任、东北音专教务副主任、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研究室主任等职。

长期以来致力于将文献学、民族学特别是考古学引进中国古代音乐史学和创立音乐考古学等工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先后入选西德《雷曼音乐和音乐家辞典》及《历史与现代音乐百科全书》(《MGG》)。著有《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以及论文数十篇。其中有的被译成多种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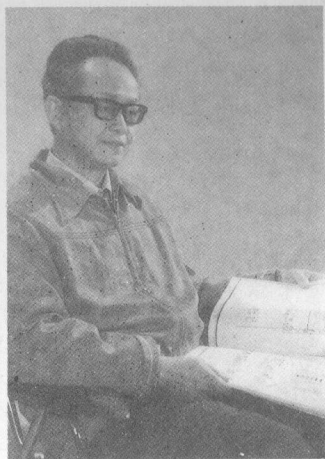
杨匡民 武汉音乐学院教授。1920年出生于福建厦门市,缅甸归侨。1944年至1945年在四川“国立剧专”乐剧科肄业。1945年至1948年底在南京“国立音乐院”理论作曲系肄业。一向从事民族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编辑、研究及教学工作。曾担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主编。曾任湖北艺术学院教务处副处长、音乐研究所所长。社会职务有:中国音协理事及民委会委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理事、《中国民歌集成》全国编委会委员。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湖北民歌音调的地方特色》、《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组织结构》、《台湾高山族民歌音调与大陆民歌音调的联系》、《楚声今昔初探》、《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刊于本期)等;发表于全国学术会议的有:《湖北民歌曲种腔调探索》、《楚编钟与民歌音阶探索》、《湖北跳丧鼓今昔论》等。



马国华 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

早年在重庆军乐学校学习铜管乐、钢琴和声学等,1948年入上海音专(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1949至1950年曾任华南文工团教练,1950年到上海复学,师从邓尔敬、丁善德等师长。1955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毕业作品《秋收》(乐队与合唱)于1956年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演出后获得好评。

长期以来在武汉音乐学院(前为中南音专)从事和声教学,在上音学习期间喜爱钻研现代和声技法。近年来在指导王安国、曾理等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中,广泛猎涉近现代作品的和声技法,致力



于和声逻辑的研究,本刊本期发表的《和声逻辑概论》一文,即是其研究成果的概要报告。

主要和声译著有:

论文:《论同宫调》(与谢功成合著)《民间曲调与现代和声结合的巴托克风格》《和声逻辑概论》

译文:《巴托克音乐中的综合性与二元性》(匈)芝德卫著,《和弦的基本功能与交替功能》(苏)丘林著,《巴托克的乐队音乐》(英)BBC欣赏指南等。